

张维迎◎著

信息、信任与法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陈瑞武主编

信息、信任与法律



· 1 ·

D90

Z190

张维迎◎著

信息、信任与法律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870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信任与法律/张维迎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3. 8 (2003. 12 重印)
ISBN 7-108-01871-3

I. 信… II. 张… III. 法学-文集 IV. D9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997 号

责任编辑 贾宝兰
封面设计 海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字 数 223 千字
印 数 05,001-10,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前 言

本书收集了我本人及我的合作者过去三年里有关社会信任和法律问题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其中《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一篇是我和邓峰合作完成，《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和《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两篇是我和柯荣住合作完成，其他四篇由我独立完成。

我对信任问题的研究兴趣一方面起源于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长期关注，另一方面来自我所擅长的企业理论的独特分析能力。最近几年，国际上主流经济学界有关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性合约的研究蔚然成风，成果累累，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对诸如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或者更一般地说，社会经济秩序，提出一些不同于其他学科又很有洞察力的论点。我自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上上了这条

道。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企业理论研究的核心是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问题，而激励问题正是社会制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非对称信息是每一个制度面临的主要约束。从激励的角度看，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包括道德和社会规范)必须满足个人激励相容的约束，并由此形成一个纳什均衡——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积极性遵守这个制度。进一步，在存在多个纳什均衡的时候，法律和社会规范是协调个人预期、从而达到纳什均衡的主要手段。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孔子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企业家(norm entrepreneur)，儒家的“礼治”(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当然不是惟一的)。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和同事，我要特别提到柯荣住、邓峰和王成，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他们的天赋和勤奋、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和丰富的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与他们探讨问题、交流观点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情，每次讨论都使我受益匪浅。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参与，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还要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感谢三联书店贾宝兰女士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努力；感谢我的妻子马晋红女士，她最了解我为这本书付出的心血。

无论对我本人而言还是就中国学术界总体来讲，有关社会信任问题、特别是信任与法律之间关系的研究刚刚起步，

我希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当然也希望自己今后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



2003年2月10日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前言

目 录

1 导论：重建信任	1
2 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	27
3 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	63
4 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	178
5 信息化与信用	252
6 信任及其解释： 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	274
7 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	308

导论：重建信任

内容提要

本章概述了信任与交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讨论了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信任危机；对信任的来源进行了分类讨论，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政府管制与信誉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重建社会信任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原本不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信任的破坏是从上世纪初对儒家文化的否定开始的，计划经济对产权制度的破坏和政府在经济生活的过分干预直接导致了人们的短期行为；信任的重建应从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法律制度的建设、非政府中介机构的培育、国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和中华文化的复兴等方面着手。

2001年3月的一天，一位朋友要向我借一笔钱。因为身份证找不到，我只好带着护照和户口本去设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中国工商银行燕园储蓄所取钱。但到了储蓄所，工作人员很客气地告诉我取钱只能用身份证，其他证件都无效，因为我当初是用身份证办的储蓄账户。我对她说，身份证只是为了证明我的身份，我现在有护照，同样可以证明我的身份，而且护照是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发的、全世界都承认的我的身份证明，为什么在你储蓄所无效？她说这是“规定”，规定就是规定，她也无权违反规定。当然，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她还是为我接通了北京市分行的主管的电话，我与这位主管在电话上讲了有20多分钟，终于说服他同意我用护照取钱。钱是取到了，但这件本来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的事情足足花了我45分钟的时间。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人们通常会认为这只是银行的规定不合理而已。但我想，这个“不合理”的规定隐藏着更深一层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银行本身不会对我本人有什么恶意。它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对成千上万的“我”没有信任。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了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许多看似不合理但看起来满有道理的游戏规则，使得交易成本大大增加。

交易与信任

社会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信任是所有交易的前提。任何一笔交易，如果买方对卖

方提供的产品的品质、质量没有信任，或者卖方对买方的支付手段和支付方式没有信任的话，交易就没有办法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信任就不会有交易发生，就不会有市场。

在资本市场上，信任就变得更为重要，因为资本市场的基本特点是一部分人花另一部分人的钱，花钱的人做出的只是未来有可能兑现的一种承诺。如果股东、债券人对经营者没有信任，他们就不会去购买企业的股票和债券。如果居民对银行没有信任，他们就不会把钱存入银行。而如果自己的钱自己只能花，资本市场就无从谈起。

在企业内部，如果企业的老总对员工没有信任，这个企业就不可能做大。如果你对他人没有信任，你就不会把权利委托给他人行使；而如果你不把权利委托给别人行使，你一个人可做的事又很有限，所以你只能做一个非常小的企业。

再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国际上很多研究表明，合资企业成功的概率非常低，为什么？就是没有很好解决相互之间的信任问题。

国家之间签署的协议也是一种信任。如果国家之间没有信任，国际和平就没有办法维持，国家的开放也不可能实现。

信任与经济增长

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经济的增长，信任与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Fukuyama,1995；Knack 和 Keefer, 1997；张维迎，柯

荣住，本书)。因为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基于分工的发展，这是亚当·斯密从一开始就讲的基本定理，而如果没有信任，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一个本来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如果没有基于对市场的信任，是不可能走向专业化经营的，因为他不会愿意冒只吃鸡蛋或只吃猪肉的风险。中国的企业喜欢搞大而全、小而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潜在的供应商缺乏信任，所以只能自给自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的积累，也就是国民储蓄。但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照这样的理论制定的推动增长的政策证明并不成功，高储蓄并不意味着高增长。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转向强调“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指的是人的工作技能和生产性知识的积累(Becker, 1975)。进一步，从90年代开始，“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在决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Putnam, 1993; Helliwell 和 Putnam, 1995)。社会资本也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合作的能力。很多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比较低，那么这个社会的市场秩序就比较乱，经济增长也比较慢(Gambetta, 1993)。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即社会成员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美国经济学家福山在其著名《信任》一书(Francis Fukuyama, 1995)中，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信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福山在这本书里特别谈到，华人社会可能是全世界最缺少信任的一个社会。他引证了许多的研究结果，指出在美国、日本、德国，人与人之间

的信任度远远高于华人社会，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也高于意大利和法国。意大利和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包括官员的腐败、市场的无序等。比如说，在意大利旅游受骗的机会就比在英国高得多。他特别强调，华人企业家只信任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族以外的人；中国人讲圈子，圈子以内是信任的，圈子以外是不信任的。这样，组织形态的交易最后只能落点在家族里，形成不了大企业。他认为，由此也说明为什么华人企业没有世界品牌，因为一个品牌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华人企业一般没有办法实行现代的管理，所以它一般都是很短命的。

中国存在信任危机

我并不同意福山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现阶段存在很大的信任危机。有一则报道称，中国农业银行决定全面改进服务质量，其中采取的一个措施是，每个储蓄所的柜台上都要为储户提供一台验钞机。这就好像从茅台酒厂拿出来的茅台酒还要请专家鉴定真假一样。这种做法听起来有点可笑，但深层原因是人们对银行缺乏信任。连银行出来的钞票也有假，我们还能信任谁呢？在中国，验钞机这个产业非常发达，我猜想，其产值占 GDP 的比重可能在全世界是最大的。这表明我们对流通中的货币是缺乏信任的。

有些日常生活中看似很小的事情，仔细分析，都与人與人之间的不信任有关。比如说，我们在饭店退房结账的时

候，柜台小姐总是让你先等一下，然后她拿起电话通知楼上的服务员，说这个房间的客人现在要 check out(结账)。她的意思是要楼上的服务员去检查一下，看看房间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只有检查完了说没有东西被带走时，你才可以离开。这里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会使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如果每个人在结账时多等两分钟，哪怕一分钟，所有顾客加起来浪费的时间总量是很大的。

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会导致很多本来不该有的社会矛盾。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医疗事故纠纷的报道，甚至有病人或其家属殴打医生的事件。仔细分析，你会发现，其中不少纠纷是因为病人一方无理取闹，而不是医院方面有什么过失，没有尽到责任。为什么病人一方会无理取闹？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医院缺少信任，所以即使医院方面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一旦发生意外，病人方面一定怀疑他们没有尽心尽力。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的服务业。经常出国的人一定会发现，西方国家的航空乘客比中国的乘客要好伺候得多。比如说，在美国机场，如果航空公司通知说由于机械故障或天气的原因飞机不能按时起飞，乘客会默默地等待，用看报或看书消磨时间，而且往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而在中国，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一定会有一些乘客(甚至是多数乘客)吵吵嚷嚷，甚至与航空公司发生严重的纠纷。为什么？除了个人修养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乘客对航空公司没有信任，所以即使航空公司说的是真话，乘客也怀疑他们是在撒谎。否则，有谁愿意拿他的生命做赌注呢？

中国原本信任度很高

前面谈到福山在《信任》一书中就把中国人之间缺乏信任归结为中国文化本身。但在我看来，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信任度比较低，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信任危机，问题不是中国人本质上就缺乏信任^①。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历史之悠久，全世界独一无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信任，中国能发展得这么大吗？

我们现在经常讨论民营企业是家族管理好还是职业化管理好的问题。其实这和秦始皇时代的“分封制”好还是“郡县制”好是非常类似的问题。“分封制”就是皇帝把国家的土地划成小块（诸侯国），然后派自己的儿子、侄子、兄弟或者亲戚，每人管理一块，每一块都是一个小国家，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家族管理。“郡县制”就是职业化的管理，它不是指派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是通过职业化的官僚队伍来进行管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宫廷曾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丞相王绾建议秦始皇仿效周朝，采取分封制，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封王，让他们帮助秦始皇统治天下。但廷尉李斯不同意，建议采取郡县制。最后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实行了郡县制，把全国划分成36个郡，1000多个县，除了皇帝外，所有的官位，上到中央下

^① 关于华人文化是否是一个低信任度的文化，国内外的社会学家有很多讨论。参阅郑也夫、彭泗清等著：《中国社会中的信任问题》（2003年）。



到地方，在全国挑选，然后派遣上岗，都没有继承性，这就是职业化的管理。但是秦国很短命，两代就完了。到了汉代刘邦建国时也有这个争论：究竟是实施家族管理（分封制）还是职业化管理（郡县制）？有人提出，秦国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实行了“郡县制”，外人是不能信任的；因为管理国家的都是外人，所以陈胜吴广起来造反的时候没有人帮皇帝的忙，最后这个朝代就完了。汉代一开始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的。但是没过多久，在汉景帝时就发生了所谓的“七国叛乱”，都是自家人叛乱，其中有5人是汉景帝的堂兄弟，另有堂叔和再堂兄弟各一人，皆在五服之内，后来都被镇压了。之后，“分封制”就基本被废除了，全部统一为“郡县制”。

从历史上看，至少从国家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有很高的信任度。皇帝如果不信任外人就不会把这些权力委托出去；官员如果不信任皇帝，他们就不会为皇帝尽忠卖命。在现代意义上，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就像现代企业中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一样。“郡县制”意味着所有官员都是皇帝的代理人。皇帝与官员之间存在着类似于现代企业中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你知道的皇帝不知道，那你当然可以坑他一把，所以皇帝看中这些人就说明对他们有基本的信任。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是发行者的信用，其价值完全来自使用者对发行者的信任。还有过去的票号、钱庄的汇票，它可以流通，有价值，也是基于人们对它的信任。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山西票号。山西票

号是中国现代银行的雏形，它开始于19世纪初，存在了近一百多年，分号曾经遍布世界，西到圣彼得堡，东到日本神户，都有他们的分号，在全中国的分号就更多了，云南、贵州、新疆都有，但总部却在山西的平遥、太谷、祁县这三个偏僻的地方^①。总部与分部的距离那么远，当时没有现代的通信工具，也没有电话，更没有互联网。如果相互间没有信任，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是“爱人”，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儒家的“忠”“孝”观念强调的都是互惠关系(reciprocity)；“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一种社会的行为规范，也是为了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而使人们之间可以更好地合作。

我举这些只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观点，就是从历史上看，不能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中国人是不讲信用的人。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国社会确实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但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吃错了药就怀疑祖宗的基因有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重建信任的问题。

信任的基本分类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对信任进行分类。一个维度是从信任的来源进行分类，信任的来源基本分为三类：一是基于个

^① 参阅黄鉴晖：《山西票号史》（修订版，2002年）。